

灾区居民恢复重建的社会资本构成及其形式

——对L安置社区的考察

王理平¹,许佳君¹,王晓怡²

(1.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2. 无锡太湖学院,江苏无锡 214064)

摘要: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由传统型社会资本和现代型社会资本构成,以血缘和地缘为依托的初级关系性传统型社会资本仍占主导地位,由此拓展开来的以业缘和友缘等为依托建立起的次级关系性社会资本还比较狭窄,灾区居民主要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还是初级关系性社会资本为主,现代型社会资本存在较大的空缺,因此,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来促进灾区居民的灾后恢复工作。

关键词:社会资本;灾区居民;灾后恢复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1-0039-04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使震区遭受了严重损失,面对灾后恢复重建,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因为社会资本与中国的社会状态有某种不谋而合之处。当前,我国社会资本主要分为传统型社会资本和现代型社会资本两个部分。从长远发展来看,灾后恢复的未来趋势在于实现社会资本的充分利用,即不仅要扩大社会资本的范围,而且要加强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

笔者在2008年至2011年曾4次进入四川省S镇L安置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共对36名灾区居民及2名志愿者进行了深入访谈。36位受访者都是S镇内的灾区居民,灾后他们的房子都不能继续居住,只能搬到L安置区临时板房区,并曾在L安置社区居住1年多的时间。在地震前,他们有的是城镇的居民,有的是农村的村民。L安置社区是S镇上的一个安置社区,S镇位于四川中北部盆地边缘,地处沱江—绵远河上游,龙门山脚下冲积扇上,属于四川省绵竹县。L安置社区是地震后S镇中最大的灾区居民安置点,但并非灾区居民的永久居住地,而是政府为了安置灾区居民而采取的一种安置措施,是一个过渡性板房安置社区。安置灾区居民2500多户,居民大约1万多人。整个板房社区的工作都是在管委会的领导下,由支部、居委会和居民小组长共同完成的。从安置点的情况看,首先,安置点所安置的基

本上属于同一地区的灾区居民,他们有相同的文化基础;其次,安置点有共同的生活地域;最后,安置点,特别是过渡性安置点一般都要存在一定的时间,在特定的时间内,灾区居民在安置点中生存、生活,发生互动。因此,可以说,安置点已经具有了社区所需要的一切要素,构成社区。这样的社区,笔者将其称之为安置社区。

二、灾区居民恢复重建的社会资本构成

1. 传统型社会资本

(1) 天然依赖的亲属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资本同样也是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1]地震后,灾区居民在面临无家可归、资源匮乏等局面的时候,主要依赖的仍是现有的亲缘等关系纽带,及所谓的“强关系”,通过亲属等的帮助生存和生活,家族亲缘关系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非正式社会制度,社会网络在灾害治理中有重要作用,被认为是灾后恢复中最可靠的资源之一。社会网络在灾后搜救幸存者、保证信息传播、提供社会支持和保持灾区群众心理健康方面有着作用^[2]。

生存和生活支持。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血缘关系网络无疑是灾区居民最值得信赖的、重要的社会资本。血缘关系是灾区居民可以利用的天然

收稿日期:2012-06-12

基金项目:河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8420111)

作者简介:王理平(1964—),男,湖南茶陵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移民管理研究。

的关系,它可以为灾区居民提供一定生存保障、经济支持、劳力支持等,并通过各种帮助以让其尽快适应灾后的生活,尽可能地适应环境,提供生活上的支援。对于灾区居民来说,灾后恢复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居住场所。不管是在盖房还是购房时,金钱的借贷关系和义务帮工上,大多数灾民所倚重的主要还是亲属和好友。当地农村自建房的补助标准是1~3口人的补助16000元,4~6口人补助19000元,多于6口人的补助22000元;城镇居民购买政府建造的安居房可以享受优惠的价格。但是政府给予的补贴并不多,对于遭受了重创的灾民来说,除了动用自己几乎所有的储蓄外,往往都还需要向亲友借钱。在调查中,多数灾区居民表示他们是向那些家境比较好、在地震中又未遭到太大损失的亲戚借的钱,其中直系亲属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频率最高。在地震后无房居住的灾民,也往往会优先选择投靠亲戚家暂住。

情感支持。灾区居民在地震中都经历了恐惧、悲伤等精神打击。在这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他们既要为重建家园而努力,还要承受巨大的悲痛。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归属感”,亲戚、邻里之间的相互扶持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支柱,就算只是简单的聊天,也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慰藉。

由“家”而衍生出来血缘、亲缘等传统社会关系资本,凝聚力强、整合度高,为处于一定社会结构或关系网络中的人们提供各种所需的社会稀缺资源,发挥着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的功能,而且是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无法取代的。这些按特殊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通过对关系的强调,实现关系网络中资源的流动与分配,使人们在关系网内容易获得各种援助和机会。在L安置社区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提供给灾区居民帮助的大部分是他们的亲戚,借钱、情感交流以及解决困难多依赖于这种关系。这种牢固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灾区居民来说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是一个集生活、感情和社会保障为一体的多功能“社会组织”。

(2) 互惠互助的邻里关系

邻里照料。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是社会资本丰富的重要体现,反之则表现为社会资本的贫乏。灾后的邻里关系,基本上同时体现出了双重变化,即融洽增进与矛盾新增并存。整体看,邻里关系融洽程度的增进也即邻里之间社会资本的增量是主要方面,而新增矛盾是次要方面和局部现象。关系融洽程度的增进表明邻里团结度和凝聚力得到提高,一是来源于共同的地震经历所激发的集体情

感,一是与地震后村民之间的互动增加密切关联。详情如下:

个案1:肖某,男,67岁,退休工人。“地震后,老伴去世了,我只能去儿子那里。但是由于这个唯一的儿子家里也受灾严重,所以我就把退休工资拿出来给儿子用。目前,儿子和儿媳妇都出去打工了,留下了我和孙子在家里。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孙子还在上小学,也需要我的照顾。3个月前,我不慎摔断了腿,孩子吃饭都成了困难,全靠邻里的帮助,及时的电话通知,才使我脱离危险,孩子吃饭上学问题得到解决。”^①

社区治安维护。在震后安置点,许多灾区居民家庭为了维持生活,选择外出打工,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他们是家庭中主要的劳动力和骨干。留在家里的基本上是些老、弱、病、残者,易被侵害,分辨事物和自我防御能力较差。而且青壮年的外流,致使社区防范工作开展不起来,责任和措施都无法落实,不能给社区和家庭提供保护。社区防范的薄弱,正好为违法犯罪留下了空隙。在L社区,地震过后为了防止盗窃等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一些居民便自发组织“联防队”值班,保护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当地居民表示,现在社区的偷盗现象少多了,社区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邻里之间的相互照应和提醒,成为社区治安防范的重要保证,也对社区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资源分配。在救援物资的分配过程中,灾民大多表示分配原则是比较公正、透明的。而且,灾民对分配物资时优先照顾“老弱病残”和特困户的做法都没有意见,认为这是合理的、应该的。大多数被访谈到的灾民都表示邻里之间没有因为救援物资分配而产生矛盾的现象发生。很多居民虽然本身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在地震中也受到了较大损失,但都明确表示救灾物资多分一些给他们更困难的家庭,他们能理解,支持政府这样做。即便是刚开始由于救援物资紧缺,灾民们围绕帐篷、食品等物资的分配偶尔出现了一些嫌隙和争吵,但也很快过去,在后来的日常生活中仍能做到互帮互助。

朋友关系的信息分享。灾区居民在社区内的信息来源于亲戚或邻里,但是由于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同一安置社区,所以他们相互之间传递的信息重复性很高,因此对灾区居民的价值就有所降低。而一些与灾民有交往的朋友或同事,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拓展他们获得有效信息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了灾区居民获取更多资源的范围。详情如下:

^①根据对L安置社区的田野调查笔记整理。

个案2:肖某,男,32岁。“2004年到2005年,我一直都在新疆打工,主要是在工地上做一些技术活。2004年的工资是每天50元,2005年则涨到每天80元,但是新疆的天气很特殊,所以一年中干活的时间只有4个月。这两年在外面打工差不多赚了3万多元钱。建筑老板觉得我干活挺不错的,他也希望我能去那边干活。地震后家里情况也不好,所以前段时间我打电话给老板,跟他说了想去新疆他那里继续打工的念头,他特别欢迎,还跟我谈好以后的工资给我150~180元一天。这段时间我就把家里的事好好安顿安顿,也能让我在那边安心工作。”^①

2. 现代型社会资本

(1) 政府的政策扶持

政府对于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是政策上的扶持。灾区居民的生活安置、生产恢复、次生灾害的防治、道路桥梁、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重建、灾区居民的身心创伤的医治、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对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进行完善等等,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公共服务都应是政府积极努力提供的。对于灾区居民个人来说,政府的许多政策也让老百姓获益颇多。有政府的政策扶持,灾区居民才能迅速进行自我及家庭的恢复重建。详情如下:

个案3:“地震后,我们每人还有500元的青苗费。这些都是土地上发的钱。关于房子的话,主要就是16000元的建房补贴,对口援建的省市还另外补贴5000元。我家属于集中进行房屋自建的安置户,除了补偿的钱,我还向信用社贷了3万元的款,如果没有贷款我们还真不知道到哪里去筹这么多钱呢!”^①

(2) 建立临时机构,提供社区服务

汶川地震后,为了切实加强灾区居民集中安置点的组织管理,四川省民政厅联合省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在灾区居民集中安置点建立临时社区管委会和临时党组织的意见》。在灾区居民集中的安置点,都建立了临时社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统筹、组织、协调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这也是在地震灾后恢复中,集中安置工作“由政府建设,全面托管”到“政府引导,群众自治”转变的社会化管理新模式。L安置社区也按照规定快速地建立起了临时的社区管理委员会以及下属组织,为灾区居民搞好社会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保证。L社区设有一个管委会,下设4个支部、10个居委会、41个居民小组,管理人员一共有100人左右。整个板房社区的工作都是在管委会的领导下,由支部、居委会和居民小组长共同完成的。管委会的干部都是从其他地方临时抽调,居委会及居民小组长的人选也

都是临时指定。L社区还逐步成立了团支部、管理协助组、生活互助组等群众自治性组织,并有几十名党员、团员和群众骨干加入到这些工作组织中来,协助管委会的社区各项管理服务工作。

(3) 民间组织的广泛参与

5·12汶川地震之后,政府在短时间内动员一切社会力量,集中充足资源全面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去,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强势毋庸置疑。但是,政府的这种高效率和强大力量只能集中作用在宏观层面,不可能关注到灾难中的细枝末节,关注到灾区居民的各种利益。对于这部分社会需求,民间组织恰好发挥了灵活优势,根据其服务的专业性提供对口服务。详情如下:

个案4:“爱心服务站”是在河南红十字会、洛阳红十字会的帮助下,组建的非营利性公益团队,志愿者来自五湖四海,成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是通过网络发起的捐赠计划所得。又募集善款为孩子们购买了乒乓桌,竖起了篮球架,购置了电子琴。随着与红十字会的深入合作,不断有国内外专家来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心平基金会”通过社会力量为服务站捐赠了1800册优质图书,筹备“慈福行动”,预计将可以帮扶600名左右的贫困学生,为他们发放每人500元的贫困助学金。服务站所发放的所有助学金都是由施奈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支持的。现在服务站越来越专业,活动也越来越多。^①

三、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表现分析

1. 传统型社会资本狭窄,但仍占主导

传统型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它镶嵌在以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等原则编制而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网中,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先赋性、封闭性和同质性的特征。目前来说,我国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以这种形态存在,并且存量相当丰富,所占比重较大。毫无疑问,在灾区居民灾后恢复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实现灾后恢复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这部分社会资本相对封闭、延伸半径小也造成了灾区居民获取其他资源的局限性。

(1) 初级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主导地位

初级关系性社会资本是指以血缘和地缘等亲朋或邻里关系为依托的社会资本。在对L安置社区的调查中发现,提供给灾区居民帮助的大部分是他们的亲戚、邻里,借钱、情感交流以及解决困难多依赖于这种关系。可以说,这种牢固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灾区居民来说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是

^①根据对L安置社区的田野调查笔记整理。

一个集生活、感情和社会保障为一体的多功能“社会组织”。

(2) 初级关系性社会资本规模的缩小

灾区居民所拥有的传统型社会资本在他们灾后恢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赵延东在研究中表明,“经济收入较低的人在灾后恢复过程中更依赖自己的强关系”^[3]。但是地震后,有的家庭与亲戚朋友失去联系,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人物的遇难,使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网络间的相互支持系统也随之不见了。当然这样严重的情况只是出现在少数家庭,而普遍的情况是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虽仍然存在,但他们从中可以获得的的社会资本却大幅度减少。这次地震受灾面积大,受灾人员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灾,他们相互之间可以提供的帮助也有所减少,社会支持的功能整体性出现弱化,因此,从“强关系”中获取的传统型社会资本的规模缩小。

(3) 次级关系性社会资本作用有限

灾区居民是一个相似性较高的群体,在生存时期,他们以强关系为主要资本;到了发展时期,强关系发挥作用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弱关系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业缘和友缘关系正是灾区居民在立稳脚跟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相对于血缘和地缘的弱关系^[4]。从现状来看,“强关系”依旧是他们利用的主体关系,“弱关系”的利用依旧十分不足,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当有限。在访谈的36个案例中,除了有1/5的个案之外,大多数灾民仍然停留在依靠血缘、地缘的层次上。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直接可以利用的业缘性或友缘性社会资本,有时还需要通过个人的关系网络激活存在于他人社会资本网络中的这一资源。

2. 现代型社会资本存在较大空缺

(1) 安置社区管理体制不完善,功能弱

因为震后时间紧迫,社区的建立和组织的配合都不够完善,许多原有社区所拥有的功能都无法发挥,所以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居民们的居住环境就是最直接的反映。由于生活设施简陋易损、社区管理缺位,导致居民基本生活条件差。根据调查,L安置社区只是设立临时的党组织和管委会,而没有形成完善的社区管理体制。一方面,原来社区管理工作人员、社区居民的作用在安置社区难以发挥;另一方面,由于时间仓促,任务繁重,在这样的大规模安置点内无法做到根据对象的不同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救助。此外,尚未建立一个上传下达的通畅的交流反馈机制,临时管委会的一些工作不能有效地通知社区内的每一个居民,而且居民的切实需求也不能得到及时的反馈。

(2) 民间组织发育缓慢,组织弱小

L安置社区安置1万多人,民间组织就只有“爱心服务站”,而且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正式成员才从2人增加到12人,虽然有红十字会的支持,但并没有较快成长,而其服务对象达到上百人,对于这样的比例,这一民间组织的规模是非常小的。当他们面对这么多灾区居民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另外,民间组织的发展主要靠自筹资金、少量的社会捐助和一定的服务收费,由于缺乏公益传统和政府鼓励个人和企业捐赠的措施有限,民间捐赠的数量很少;同时,政府限制民间组织从事经营活动,使民间组织的经济力量更加薄弱。因此,民间组织的数量也很难实现规模的增加。再从民间组织的成员人数、经费支出、活动范围等方面来看,中国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是属于小型民间组织,“爱心服务站”同样如此。

(3) 社区志愿者难以提供专业的和稳定的服务

灾区的大部分民间组织制度性不强,志愿者大都是具有爱心和奉献精神的青年学生以及社会人员,来自社会上各种不同层次,生活背景、文化水平各不相同,而且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技能培训,也没有从事过这样的服务,因此参与专业的知识欠缺,不能切实根据居民的需求设置服务项目和提供相应的服务。由于民间组织的非营利性、自愿性等特征,这些志愿者本身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种不稳定性难以实现服务的对接,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灾区居民的情绪。而且还会使后期组织的培训无法起到有效地作用,志愿者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整体性地提高。

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以血缘和地缘为依托的传统型社会资本是灾区居民在灾后恢复过程中利用率最高的部分,为灾区居民提供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现代型社会资本存在较大空缺,灾区居民通过社区组织寻求帮助的人较少,参与热情明显不足;民间组织在灾区内数量少,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有限。应从灾区居民自身、政府、社区和民间组织这几个方面继续发掘社会资本,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来促进灾区居民的灾后恢复工作,让灾区居民更快、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新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03.
- [2] 赵延东. 社会网络在灾害治理中的作用:基于汶川地震灾区调查的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1(8):68-76.
- [3] 赵延东. 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J]. 社会学研究,2007(5):164-187.
- [4]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